



经济民族学学科构建刍议

[文章编号]1001-5558(2019)03-0045-09

● 郑 宇 杨 素

摘要:经济民族学立足民族学学科本位,聚焦经济的民族表征与民族的经济构建,即从民族的角度探析经济的运作机制,从经济的维度阐释民族的构建与演化,在对既有理论的批判性运用、学科理论体系的探索以及系列民族志实践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门具有领域开拓性与理论超越性的新学科。

关键词:经济民族学;经济人类学;民族学;民族经济;学科构建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如果我们把“民族(MinZu)”视为可能具备某种血缘或地缘关系、集体记忆与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认同等必要共享资源的人类共同体,那么这一概念便能够容纳“族群”概念,从而拥有充分的时空弹性与表达形式的多样性。在把“经济”视为通过资源价值的创造、转化、流通和实现,来满足人类各群体生活需求的系列活动的基点上,不同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不同的经济类型、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不同的目标差异”^[1]。这是因为,囊括了礼物交换、再分配与市场交换等丰富内容的人类经济活动,总是不同程度地与不同民族的具体个体行为、家庭生活、亲属制度、宗教习俗、群体价值观及社会制度等紧密嵌合。即便在当前全球化时代,通过民族生计方式转型、民族文化产业化、少数民族扶贫、跨境贸易和流动、移民与难民生存适应等方面,经济活动依然深刻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即族性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协作组织的经济功能转型与提升研究”(编号:16XJA850001)的阶段性成果,并获得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的资助。

[收稿日期] 2019-06-20

[作者简介] 郑宇,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电邮:eayea@163.com。昆明650000
杨素,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电邮:1163122245@qq.com。昆明650000



(ethnicity)特征^①。民族因此是观察、阐释人类经济活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视角。反之,各民族的构建与发展也从来离不开经济要素的参与。当然,随着历史发展阶段与人类社会性质的不同,经济要素影响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具体方式与机制是不断变化的。

聚焦民族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无论对于民族还是经济而言,都将为我们开启全新的视角。然而遗憾的是,尽管相关研究已经从不同角度切入这一命题,但从民族学学科本位出发,采用整体性视角并专注于二者关系的探讨至今匮乏。经济民族学因此将立足民族学本体,着眼于探析经济的民族表征与民族的经济构建,以创建一门具有领域开拓性和理论超越性的学科体系。

一、经济民族学构建的学科背景

经济民族学与民族经济学、经济人类学显然存在不可割舍的密切关联。杨堃先生已于1985年提出“经济民族学”概念:“我所说的经济民族学,也叫做经济人类学……它是介乎政治经济学与民族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它是以民族学调查方法研究各落后民族的经济生活,并以此为对象的一门科学。”他还认为“我国少数民族经济学,它的科学性质是属于经济民族学的”^[2]。先生的设想极具前瞻性,他的理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整合政治经济学、经济人类学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以形成一门全新的学科。但这一宏大构想未能如愿实现,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应该是与学科定位尚较为模糊有关。经济民族学学科的再次提出,绝不只是对前辈学者学科构想的修正和实现,还旨在推动学科真正回归民族学母体,并以此构建自身的学科体系。

具体从相关学科的发展来看,由于在经济学与民族学之间定位不清,民族经济学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学科在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后,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障碍和困境。在学科初建时,民族经济学属于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直至今日,国内大部分相关研究机构仍将二者归属于经济学。但也有相当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应当归属于民族学,定位于中国经济民族学^[3]。而导致长期争论的根源正是学科母体的显著差异。以区域经济学为主导范式,“民族经济学创建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决定了20世纪80—90年代的研究从区域和民族的特殊性出发,更多地关注发展问题,在研究特殊性时也关照了‘非经济因素’等对民族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对经济过程的文化因素及其影响研究不够,2000年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加强。”^[4]尽管有意识地强化了对经济问题的文化分析,但由于大部分研究并没有开展民族学人类学视为立身之本的参与式田野调查,因此导致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长期难以对话的尴尬局面。

文化分析的匮乏与研究对象的失焦具有直接的因果关联。尽管声称关注民族发展,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尤其是区域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决定了既有相关研究常常以区域来替代民族对象。由于“国家疆界与民族界限的重叠交叉,又往往使许多民族分属于不同的国

^① “族性”一般指血统与文化的社会构建、血统与文化的社会动员以及围绕它们建立起来的分类系统的逻辑内涵与含义,是民族或族群等人类群体所共同具备和共享的要素。参见[英]斯蒂芬·芬顿,族性[M]. 劳焕强,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3-4.



家,或在一个国家实体中包容了众多的民族,……(造成了)处于同一地域的不同民族共同体与当地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不同步现象。”^[5]区域经济与民族经济的非一致性发展,甚至会遮蔽基层少数民族的真实经济样态。研究对象的失焦还可能表现为另一种倾向,即部分研究“把该学科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极端的膨胀,从中国到世界,似乎无所不包。……若按这种体系,把‘民族’进行了彻底的抽象,其学术研究的指针就成问题了。”^[6]

缺乏对少数民族经济长期的深度体验、感知和把握,甚至完全没有民族志田野调查资料的支撑,决定了既有研究大多只能囿于区域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范围内展开讨论,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创建富有创新性的理论分析模型,进而开辟一块分支学科独有领地的可能性。循此路径继续前行,曾经理想的经济学与民族学的联姻可能终究难以实现。

可资借鉴的是,西方经济人类学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历过与之类似的、长达十余年的学科性质与研究方法的争论,并已在相当程度上回答了经济学与人类学如何结合的问题。虽然作为与实体论派相对立、力主采用主流经济学方法的形式论派,与前者存在直接的理论预设、分析视角、核心观点等诸多方面的尖锐对立,但它们具备相对一致的前提立场,即将研究建立在坚实的民族志资料的基础之上,即便资料可能是二手的甚至是三手的。于是,形式论派构建了渔猎采集生计运作模型,家庭劳动力配置分析模型,农村市场地理结构模型,迁徙部落流动工资测算及商业企业决策模型,以及生态资源、牲畜存量与文化变迁关系模型,提出了影响深远、基于边际效益递减的农业“过密化”学说等等。它们不仅推动了人类学的显著发展,同时也在修正、补充、挑战主流经济学的过程中,构成了主流经济学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场争论向我们明示,无论采用民族学人类学擅长的整体性视角的文化阐释,还是采用经济学构建模型的形式分析,甚至来自更多不同学科的对同一研究对象的切入,都能够殊途同归地直击民族经济问题的实质。但必要的共识起点在于,在扎实、深切把握民族经济生活真实状况的基础上,聚焦、追问具有学术深度和理论创新的真问题。

当然,立足于人类学的西方经济人类学也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演化出经济民族学这一学科。从发展历程来看,虽然人类学传统上注重对边缘群体的调查研究,但其中的少数民族从来都只是边缘群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类别而已。简言之,经济人类学从来就不是专注于民族经济的学科。尤其发展到当代,在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精神分析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的共同滋养中,经济人类学研究“已经拓展到生产方式、交换体系、消费文化、经济社会制度、生态、贫困、发展、社会性别、食物、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及学科基础理论等领域”^[7]。而在理论方法方面,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主流经济学方法的大量运用,“这种变化趋势使得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8]。在一段时期中,部分学者甚至认为经济人类学其实已经与经济学别无二致。可见,学科的显著泛化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方面对民族对象的失焦,同时也体现在理论方法方面与民族学学科的疏离。西方经济人类学因此无论在学科起源与当前发展方面,还是在研究对象与理论方法等方面,都已经展现出与本文讨论的经济民族学的迥异旨趣。

更值得重视的是,西方经济人类学中一些关键理论预设是需要谨慎反思的。例如,该学





科传统上高度重视礼物互惠交换,其中隐藏的理论预设是,前现代社会中各族群的经济活动封闭性极高,即便如“库拉”那样大规模的交换活动也是如此。该学科的主要目标是,发现区别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另一种交换体系的存在。但这种潜藏着西方中心论的理论预设并不符合中国民族经济的状况。因为,中国各民族的经济活动除了礼物互惠之外,同时还借助皇权制度中的国家与市场的双重性运作,很早就已经将各民族群体裹挟其中,从而塑造了中华民族经济层面的“多元一体”事实^[9]。可见,成长于乡村、市场与国家三重维度交织之中、具备多层次立体结构的中国经济,离开任何一方都难以有效阐释其实质。类似的基于历史事实与坚实调查的理论批判,正是构筑经济民族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石。

经济民族学因而是在民族经济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学科归属定位模糊,西方经济人类学研究对象逐步疏离民族本体以及部分理论预设与研究方法需要反思重构的背景下,倡导从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回归于民族学母体,从而系统性、整体性地探索民族与经济相互作用的一门新学科。

二、学科的理论基础:经济要素与民族构建的关系

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等学科出发,学者们已经从不同视角各有侧重地探讨了经济要素与民族构建的关系。既有研究是经济民族学理论探索的重要基础和起点。

第一,具有经济决定论导向的路径,即经济要素是民族构建的基础性乃至决定性要素。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范畴,揭示了经济要素对于构建、改造人类社会关系的基础性作用,这一研究主要基于以摩尔根等为代表的社会单向进化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氏族的生存主要依赖原始共产经济。生产资料的增多、劳动部门职能的分化、交换行为的频繁出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经济要素的变化,导致了公共财产的私有化。个体私有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10],逐步催生了阶层分化乃至保护私有财产的力量——国家的形成^[11],从中可见经济要素对于推动早期氏族社会向民族国家转变的基础性作用。

具有强烈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四个客观要素说^[12],进一步强调了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动因,并形成延续至今的深远影响。无论是以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诸多学科,还是作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常识”,通常都理所当然地把经济发展视为推动民族社会形成、分化、演进的核心动力。当然,这类认知路径也就被赋予了浓烈的经济决定论色彩。

第二,以“嵌入”理论为代表的具有社会主导论倾向的路径。波兰尼立足前现代社会,指出人类的经济行为是嵌入其社会关系之中的^[13]。基于不同性质的人类社会,他提炼出三种社会整合模式,即互惠、再分配与市场交换。其中,互惠秉持对称性原则,集中体现于小规模亲属或地缘熟人社会之中,主要通过连绵不断的礼物互惠交换,实现熟人社会的持续巩固和再生产。再分配采用集中性原则,主要体现在具有某种实际的或象征的权力中心,并与之对应的较大规模的、阶层分化的民族社会之中,如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社会、前现代社会中的各类帝制国家等。权力中心通过财物的再分配方式,实现了对内部各族群的统治和支配,并强化了既有的基于身分与财富区隔的不平等社会结构。



在波兰尼的基础上,萨林斯进一步引入“社会距离”维度,将互惠扩展为慷慨互惠、平衡互惠和负性互惠^[14],进一步确认了各族群成员交换的方式、频度与性质主要是由他们的社会关系的亲疏程度及其空间分布距离决定的。经济人类学中的实体论派,由此揭示了社会本身对于经济运作所具有的主导、控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理论路径与族群理论中强调关注族群所置身的具体时空与社会文化场域的“情境论”,具有内在的逻辑相似性。

第三,资源配置的权力主导及其批判理论。这一理论路径聚焦通过政治权力来配置资源,由此产生对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凝聚或破坏作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涌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中的世界理论体系。以沃勒斯坦、弗兰克、萨米尔·阿明等为代表的学者,指出全球范围内的各民族国家之间,因为市场经济分工的依附关系而形成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性的不平等体系。学者们发现,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因为“当我们谈论‘不发达’时,问题的本质其实是不平等的全球权力关系”^[15]。现代社会由市场经济的制度化运作所造成的结构性的不平等,并不仅仅在全球各民族国家之间得到体现,同时也普遍出现在各国内部的各民族之中。而当代民族矛盾与冲突的本质,在相当程度上便可以追溯至基于市场经济的资源博弈,它们借助“民族性要素在资源博弈过程中的广泛运用,根源于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不平等,也是对不均衡发展表现为域化形式的一种回应”^[16]。

在现代市场经济之外,民族性要素也常常在资源博弈过程中得到运用和展现。例如,原本是游牧族群的巴加拉人在与富尔人接触的过程中,为获得富尔人的草场资源而将自身纳入到富尔人的族群之中;而定居的富尔人为了获取投资牛的利益,也通过游牧化加入了巴加拉族群^[17]。可见,“当族群性被表达为是对于所有群体都认定是珍贵的珍稀资源而展开的经济和政治竞争时,族群性就获得了它全部的最显著的重要性”^[18]。这类围绕生存资源、经济利益或支配性权力资源而展开的族群竞争和博弈,显然是与族群理论中的“工具论”一脉相承的。

第四,经济要素与民族构建互动论。具有代表性的如20世纪30年代斯图尔德所开创的生计方式研究。从生产技术、工具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生产技术与人的行为方式的关系,以及行为方式对文化其他方面的影响出发,斯图尔德推导出技术、环境与族群行为文化相关联的三重互动分析^[19],由此阐明越是“原始”的生产工具越会受制于环境的制约,而族群随着生产技术掌握程度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能够更加适应环境,创造出更具“效用”的文化核心要素,进而对族群的家庭制度、政治制度、风俗习性等产生一系列重大影响,特定生计方式及族群文化因此构成了相互构建的关系。与之相应,林耀华与切博克萨罗夫于1958年共同提出的“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学说,同样高度重视生计方式与民族社会文化类型之间的相互构建作用,“其概念本身就把经济与文化组合在了一起”^[20]。这类强调经济要素与民族社会文化类型相互生成的理论路径,与族群理论中以巴斯为代表的边界互动理论具有论证逻辑的内在共通性。

第五,经济运作的文化符号逻辑构建路径。在当代影响重大的阐释人类学的引导下,这一理论脉络的实质,可以说是强调文化符号逻辑主导乃至决定族群的经济生活规则,及至族



群社会的生成和发展。其中的代表性学者萨林斯,针对石器时代的经济行为予以文化价值观念阐释,指出基于“原初而丰裕的社会”所形成的,诸如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资源开发的有限性、反剩余积累等一系列文化逻辑,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于采集狩猎生计的选择和坚守,由此造就了以家户为单位的低度生产模式,包括资源与劳动力的低度利用及其普遍短缺。与之相对,在高度生产的部族社会中,“不论亲属关系、首领权威还是仪式规则,它们不但是社会体系的一部分,更是决定经济的力量。这些力量依托家庭之上的社会结构,以及生产过程之外的文化结构,控制着社会经济的张弛。”^[21]由亲属关系、权力制度和仪式规则共同构成的社会文化逻辑的结构性转变,赋予原本处于无序离散状态的个体家庭以整合力量,进而通过物资的内向流动、集体生产目标的强调、家户内部的分配运动等,汇集形成了一个高度生产、社会整合力度也更强的家族社会共同体。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进一步表明:“所有的文化符号与实践——从艺术趣味、服饰风格、饮食习惯,到宗教、科学与哲学乃至语言本身——都体现了强化社会区隔的利益与功能。”^[22]在此意义上,族群内部乃至民族之间的社会区隔,当然同样会在当代民族文化的符号化生产中构筑。这种经济运作的文化符号逻辑构建的理论路径,与族群理论中的“原生论”同根同源,因此具有较为明显的理论基点与研究目标的一致性。

综观以上经济要素与民族建构关系的研究,在对象方面分别关注了民族的诸多亚层次,涉及从家户、氏族、家族、族群、部落联盟、村落、民族、国家乃至世界体系的广阔范围;再从对于二者关系研究的基本路径来看,分别表现出经济决定论、社会主导论、权力主导论、互动论以及文化构建论的理论主张或倾向。毫无疑问,既有研究针对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性质的民族社会群体,通过从不同视角的深度切入贡献了诸多真知灼见,并为经济民族学的理论探索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但问题在于,既有研究均不同程度局限于特定的时代、对象或范畴,缺乏对于民族建构与经济要素相互作用机制的整体性的系统理论阐释,而这正是经济民族学学科构建的起点所在。

三、经济民族学学科属性界定与批判性分析尝试

经济民族学以民族学为母体,立足民族学学科本位。在对既有理论的批判性运用、学科理论体系的探索以及系列民族志实践的基础上,它聚焦经济的民族表征与民族的经济构建,即从民族的角度探析经济的运作机制,从经济的维度阐释民族的构建与演化:一方面,从族性角度展开对世界各民族主体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经济领域的探析;另一方面,从经济的视角来剖析民族问题,涉及民族构建、文化差异、社会分类、民族身分与认同、族群组织、社会等级与民族分层、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族际互动、民族主义、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等等。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从经济民族学视野出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社会文化情境中,“民族”这一庞杂概念可以而且需要具象化为氏族、部落及其联盟、支系、族群、民族国家等实体单位,乃至更为基础性的乡镇、村落、家族、家户、家庭等亚层次。与之相应,在各民族经济生活的内部,除了市场中流通的商品、庞大的产业结构等之外,还有深度嵌入他们社会生活的传统生计方式、礼物与劳动力的交换、社区再分配机制、仪式与习俗消费、民族价值观及



其经济行为等的长期存在。正是在此意义上,各民族的经济研究绝不可能简单等同于区域研究,也绝非单纯的量化统计所能胜任。

学科构建因此有必要从核心概念的批判反思开始。一旦从广义的民族视角来重新审视,即从经济要素的民族表征出发,“经济”概念便会呈现立体层次和丰富意涵,从而为学科的构建提供足够宽广、坚实的土壤。

对于民族共同体而言,经济绝非只是意味着某些资源要素的流动或配置,还拥有复杂的结构性差异与多样的表达形式。从最直观的民族构成层次来看,就可以划分出亚层次的族群经济,族群或民族之间的族际经济,以及民族、区域与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动关系等。进一步从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民族以及民族存续的不同“需求”出发,在民族生存的意义,经济便意味着谋生手段即生计方式。生计方式显然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均具有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作用,然而,生计的重要程度会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改变,甚至在当代的部分民族社会中可能演变为构建族群的附属性要素。在民族社会秩序维护与安全保障的意义上,经济则通常意味着再生产与消费的保障,所以与共同体的再分配机制息息相关,从而表现为基于亲属、地缘关系的共同生产、相互换工等具备显著集体性的组织方式,或者基于部落联盟、国家权力中心的再分配制度;在民族交往与拓展的意义上,经济更多表达为联系和巩固人们交往的族内与族际物资、劳动力和信息等的流动,囊括了互惠、婚姻交换、市场交易,以及基于象征或实际权力的再分配等多样形式;在民族认同的意义上,经济常常被用作维护群体社会秩序、强化民族或国家认同的手段,乃至衍生社会再生产或巩固群体伦理道德的功能。经济因而具备多重的民族表征及相应的多样表达形式。

再从民族的经济构建层面来看,经济要素是影响民族构建的一个变量。经济要素曾经一度被默认为横跨时空,对于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不变量;与之相对,在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族群理论中,经济要素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者被放置到前所未有的边缘地位。如此悖论式的极端对立态度其实表明,经济要素对于民族的构建、影响的方式及其程度,是随着民族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以及民族性质、结构与特征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

在不同时代,经济要素对于民族构建的影响差异巨大。即便在早期简单社会中,经济要素对于共同体的作用方式也是错综复杂的。首先,如在由群体生存原则主导的采集狩猎氏族群体中,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是相互高度嵌入、彼此高度一体化的。在这类社会中,群体生存作为至高核心目标,决定了经济的重心主要在于生产环节。这也就意味着,围绕采集狩猎所建立的一整套生计系统,便是氏族群体存续的基础性乃至决定性因素。从技术行为来看,行为主体直接从自然界获取植物与动物资源,而且生产效率通常颇高,如“对于每个成年劳动力来说,这就意味着每周需要工作一天半到两天”^[23]。而保证生产效率的关键当然是采集和狩猎的组织水平。他们的生存性智慧“集中地通过社会生活的集体性体现出来”^[24],这种集体性即建立在氏族血缘基础之上,基于年龄与性别的自然分工,还形成了氏族内部共同生产、平均分配和消费的常见经济运作方式。高度集体性的、公有化的经济组织方式,随之不断强化着氏族内部的社会认同。

然而,集体化程度极高的采集狩猎生计以及与之配套、高度亲密的血缘组织方式,并不





会必然产生同样高度协调、没有冲突的社会共同体。这是因为,采集狩猎生计所伴随的资源稀缺性所导致的供养人口的有限性,以及直接依赖自然环境的高度风险性,迫使氏族共同体产生了持续挤压甚至破坏自身的内在冲动。一旦群体生存与资源保障发生冲突,氏族只能选择牺牲部分个体的方式,通过残酷的人口控制手段来确保共同体的整体存续。这样,在这类群体中的“杀婴”“杀老”便成为屡见不鲜的现象。所以,经济要素对于这类共同体构建的影响也是一体两面的。

其次,在受依附性支配主导的部落联盟、封建国家或皇权国家中,基于某种权力中心的不平等社会结构已然确立。资源配置主要借助资源敛集于一个中心之后再次分发的再分配机制,再辅以大规模的炫耀性消费等方式,以此来巩固不同族群或民族的地缘联合。再分配与炫耀性消费因此成为了社会控制与秩序再生产的常见经济手段。例如在北美西北海岸印第安人的仪式习俗“波特拉赤”即夸富宴中,部落首领往往通过大量分发食物乃至烧毁毛毯的极度夸耀的再分配与消费方式,将自己的财富全部散尽。正是借助这种不对等的资源消耗,首领达到了压倒竞争者、强化民众认同,从而构建自身权威地位的目的。在更为大型的中国皇权社会中,市场本身并没有获得独立发展的空间,而是同样在皇权统治的裹挟下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再分配的一种特殊形式,服从于整合民族社会的首要目标^[25]。在此意义上,经济增长和发展通常不会成为这类社会的首要目标,因为其中的经济要素主要被统治阶层用作民族社会控制和整合的手段。

而在当代,关于经济要素与民族构建关系的分析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可能路径,至少包括少数民族经济交往与族群关系、遗产的保护开发与族际关系互动、经济文化类型与族群交往影响、现代市场经济与民族主义演变、消费行为中的族群认同与族内社会分层、资源博弈与民族集体记忆和文化重构、扶贫发展与民族认同关系反思,以及当代民族价值观、经济行为演变及其与族群认同的互动,还有跨境流动与共享经济背景下的民族国家关系演变等等。

四、结 语

经济民族学呼吁研究的主体回归民族主体,聚焦的核心回归民族经济问题的本真场域,学科的属性回归民族学母体,经济民族学的学科构建因此是学科性质与架构的根本转变,是从研究对象到基本理念、从调查分析方法到逻辑体系的深刻变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既有学科与理论的摒弃,而是以它们为基础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因此,经济民族学既具有学科历史积累的坚实基础,同时更旨在通过相关学科的有机整合实现质的超越。这一学科主张秉持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法,积极采纳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富有成效的理论方法,在对各民族经济生活的“深描”中书写民族志作品;将民族经济活动视为一个子系统并关联于相应的民族社会文化背景,一方面从不同的经济事项中挖掘其深层的族性动因,另一方面力图从不同的特定民族社会行为、活动和事项中揭示其经济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机制,由此去深入理解处于同一时空中的不同民族经济发展类型,处于同一经济过程中的不同民族的经济体系,以及不同民族经济体的不同经济行为 and 不同价值追求。这一学科的直接目的,是构建一门真正针对经济的民族运作与民族的经济问题,具有前沿性、透视



性与反思性的新的学科;而其终极指向则是回归人本身,即在把人类不同民族视为整体的“类”的基础之上,在民族与经济视角的深度交织中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存之道。

参考文献:

- [1][5][7] 陈庆德,潘春梅,郑宇.经济人类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2.376.135.
- [2] 杨堃.论拉法格对民族学与经济民族学的贡献[J].思想战线,1985,(01).
- [3] 包玉山.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学科归属问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04).
- [4] 黄健英,于亚男.改革开放40年民族经济学的发展[J].民族研究,2018,(06).
- [6] 李忠斌.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宏观思考[J].思想战线,2004,(03).
- [8] 施琳.论经济人类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8,(02).
- [9] 郑宇.经济人类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经济人类学[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9,(01).
- [10][1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C]//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4.97-107.
- [12]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C]//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4.
- [13] [英]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M].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96.
- [14][21][23] [美]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M].张经纬,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221-226.117.27.
- [15] [英]凯蒂·加德纳,大卫·刘易斯.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M].张有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7.
- [16] 陈庆德.资源博弈过程中的民族性要素[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01).
- [17] [挪威]贡纳尔·哈兰.民族过程中的经济决定要素[C]//[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48-62.
- [18] [挪威]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M].董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353-354.
- [19]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229.
- [20] 龙远蔚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72.
- [22] [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7.
- [24] 范可.狩猎采集社会及其当下意义[J].民族研究,2018,(04).
- [25] 陈庆德.皇权制度的二重性与中国民族经济进程[J].战略与管理,1998,(03).

(责任编辑:众 采)